文物探究

太昊陵墓碑考

雷铁梁

以碑探史,透过古人于碑石上的书丹镌刻,我们得以窥探历史迷雾中的一些光亮。如今,太昊陵里存留的几百通碑刻也让文献中看不见的史料被重新定义,起到了证经补史的作用。

太昊陵前的主墓碑历经岁月沧桑、风雨侵蚀,现在只能勉强认出上面的两个半字“太昊伏”,当然,这与碑的石材不是太好有关。一直有个不成熟的设想,是否能在这块弥足珍贵的石碑前加一层薄碑,刻上同样的字,把原碑保护起来?但在得失之间总觉难尽人意,就暂时把这想法停留在想象中了。

考究的意义就在于把握已逝,使得“物”具有真正不朽的意义。此碑就尾字是“莫(墓)”还是“陵”“陇”之间,以及刻制年代方面颇有些争议。民国五年《淮阳县志》对此碑也有过探讨:“《宋太昊伏羲氏墓碑》:此碑在太昊宓羲氏墓前,碑高丈五,字大尺半,笔力雄伟,苍老古劲,惜摹抚未能稍似。下一字似陵又似陇,现碑上此字已磨灭不能辨认。相传此碑为苏文忠女弟巾书,或以为苏长公书,虽无款识,以其剥蚀之状观之,要知为有宋时物无疑。”

其实多版的地方志已经记载得很明确,如道光六年《淮宁县志》:“城北三里许,羲陵在焉。陵前碑书‘太昊伏羲氏之陵’。殿宇巍峨,屹如山岳,诚千秋名胜地也。”太昊陵墓碑尾字是“墓”或“莫”,我觉得不应该有啥争议。古人立碑不会把伏羲“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随便给降格的,“如帝制”的太昊陵称“墓”的可能性没有。

但淮阳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故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带着全家及妹妹苏小妹,从汴京出发去杭州任通判。路经陈州的时候,在时任陈州教授的弟弟苏辙家小住。陈州民众听说大才子苏轼来了,就推选代表,想请苏轼给太昊陵题写墓碑。苏轼答应此事后写了几次,都感觉不满意,于是丢下笔出门散心去了。苏小妹恰好从外面回来,一看家里没人,桌子上还摊着哥哥写的太昊伏羲氏的墓碑题字,忍不住拿出汗巾,蘸上墨汁在纸上“唰唰唰”写了七个字,然后就出门找哥哥去了。这时候求字的人上门一看,屋门敞着里面没人,但桌案上放着一幅写好的字儿,笔力强劲,气势雄伟,以为是苏轼所书,如获至宝地赶紧拿回去请匠人刻制。过了几天,苏轼和苏小妹去太昊陵游玩,见陵前的墓碑已树了起来,苏轼一看写的是“太昊伏羲氏之莫”,笑问苏小妹:“写得倒不错,怎么有个错别字啊?”苏小妹笑而不语。苏轼恍然大悟,原来是借大地为土,莫土为墓啊。这就是“太昊伏羲氏之莫”的来历。

坊间传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记忆,人们在口口相传时辗转加入了想象,并对一些自然或社会现象进行“幻想”式解释。苏小妹与秦少游是民间传说里才子佳人的重要依托对象,“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也脍炙人口。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当苏轼、苏辙兄弟出川应试,开始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宦海生涯时,已无姐妹在世。在此前,苏轼倒有一位胞姐叫苏八娘,属于那种“小清新”型美女,聪明好学,活泼伶俐,但婚姻不幸,嫁入程门,18岁产子后病逝。世人同情她的悲惨命运,给了她“苏小妹”的芳名,让她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字少游)婚配,算是对她的惋惜和安慰吧!但实际上她去世时,秦观才三岁。所以,故事仅仅是故事,并非现实。

考史的意义不仅局限于证经补史,还发挥着重建历史的作用。翻阅史料,顺治版《陈州志》是这样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的太昊陵的:“万历四年,督学副使衷贞吉疏奏留输帑三千金,又大修之。其规制则南临蔡河之滨,曰:灵星门。左坊曰:继天立极,右坊曰:开物成务。其次为券门,三扁曰:先天门,又次称为无梁殿。岁久,材朽不堪,重建亦改为砖券门,三阖。其内则戟门,戟门则钟鼓楼,楼北则正殿五间,雕墙黄瓦,彩绘金碧,称为帝居。后殿规矩亦颇同前,其后为砖甃高台,上建翠阁,下为券门,扁曰:太始门。而阁则贮御制碑焉。门内则为陵。陵前树碑,大署曰‘太昊伏羲氏之陵’。陵下则筑方台。台周则砌砖垣,垣南亦辟三门。”后来的方志也延续了这种说法。当然,这段文字至少有三处错误,一是朝廷没有同意“留输帑三千金”大修之,而是河南地方官府自筹的修建资金;二是并非督学副使衷贞吉上的奏疏;三是这次修建不在万历四年,而是万历三年已经竣工。

据万历四年(1576年)农历二月十五河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吴国伦所撰写的《重修太昊羲皇陵庙记》记载:万历二年,副都御史吴道直、河南道监察御史褚鈇,按照河南督学副使衷贞吉的建议,“具疏请得留输帑金三千金,大治之如宪庙”。上奏朝廷后,工部回复:“议治陵如两臣言,第不得留帑金以薄边实。”意思是说,同意你们两人(吴道直、褚鈇)修陵的建议,但不能扣留上缴国库的银两而使该拨给边防的钱款减少。“为主计者忧,其便宜图之”,多替管理财赋分配的上级考虑考虑,想修太昊陵庙,你们自行想办法解决吧。

到了万历三年“四月,御史臣(刘)尧卿按部陈州,沐而谒陵庙”,认为“奈何惜三千金,使祖宗之制荡然,又安在其表中土而称今皇帝德意”。于是,经过请示佥都御史孟重,商议由河南布政使鲍承荫负责经费保障,河南按察司佥事计坤亨负责规划,陈州知州洪烝负责建设及监工,通过从地方财政盈余中想办法解决,使用罪犯为免费劳动力,当年7月开工,12月竣工。“是役也,因财于公羡,因役于刑徒,不薄边实,亦不侵民力,经始于七月,而以十二月告成。”这说明万历三年工程已告竣,而此事的立碑时间是在来年(万历四年)二月。至于这次修陵是否使用了免费刑徒,花没花到“三千金”,碑文无载,不得而知,既然役力免费,还是省了些许吧。

关于顺治版《陈州志》里“陵前树碑,大署曰‘太昊伏羲氏之陵’”这句的理解,是万历三年(1575年)在陵前树的新碑、碑上刻写“太昊伏羲氏之陵”呢,还是依旧用的老碑、说不定是宋代传下来的呢?我感觉两种可能性均有。民国五年《淮阳县志》中提到此碑“下一字似陵又似陇,现碑上此字已磨灭不能辨认”。距今仅仅过了百多年,现在从“伏”以下,“羲氏之”这三个字也全不可辨了,说明碑材质量不是太好,不耐岁月风雨、烟熏火烤。另外,太昊陵里其他现存碑刻,年代最早的是正德八年(1513年)所立的洪武四年御制祝文碑,而仅仅这通墓碑为宋碑吗?况《陈州志》记载:“靖康而后,祀事不修,庙貌渐毁,至元末而荡然无遗矣。”按照万历四年《重修太昊羲皇陵庙记》记载的建设时间,假如墓碑为当时新刻,那么距今也有近450年的历史了,其剥蚀之状也未必不符合岁月流失之情况。不知道碑刻时间有没有现代科学鉴定的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

历史在岁月流逝面前,皆公平地烟消云散,唯余留惹后世无限揣想的文字与遗迹。久居淮阳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号称宛丘先生的张耒曾写过一首《谒太昊祠》的七律,尾句是“旧游零落今谁在?尘壁苍茫字半存”。

岁月蹉跎,过往成尘。陵前虬枝如龙爪般的参天古柏下,那块万人膜拜的碑碣,激发起无数后来者的向往之心。历史与现实,就以这种方式交迭在这座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陵园之中。曾经的真实或许会湮没在历史中,但通过考古和文献,我们可以接触到些许痕迹。最近,相关部门正在对淮阳现存的历代碑刻进行全方位辑录,还没有发现有关于宋代太昊祠此类内容的。或许,在之前的历史中,我们的疑惑、思考,以及传说的悲欢离合,都曾有过,只不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进行。这些“字半存”的北宋时期乃至之前的“太昊祠”古碑,踪影难觅。笔者内心真的希望这通墓碑就是张耒当年所见的唯一幸存吧!

翰墨抒怀

土耳其风情

李学峰 作

书画欣赏

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四首(其三)

黄庭坚

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
仙风道骨今谁有,淡扫蛾眉簪一枝。

刘佰玥 作

名家视角

张伯驹笔下的于右任

任动

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对历史名人于右任作了绘影传神的描绘。

张伯驹主编的散文随笔集《春游琐谈》,凡7册,共314篇,涉及作者35人,实为一部文人雅集、纵笔文墨的合集。《春游琐谈》所录文章用笔随意,有感而发,率性自然,史料丰赡,既可当作精美的小品文来读,亦可补史乘之不足。

《春游琐谈》收录张伯驹散文71篇,按照作者自己的理念,分为掌故、金石、书画、考证、词章、轶闻、风俗、游览8个类别,文章多用白描,秉笔直书,逸趣横生。

先说说《春游琐谈》中的掌故。掌故本是汉代掌管礼乐制度的官职名号,后来借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遗闻轶事。张伯驹出身豪宦、见多识广,兼以阅历丰富、洞悉人情,因此对清末以来的政坛、文坛、艺坛、骚坛等诸多掌故,了然于胸,信手拈来。《春游琐谈》中的《陕西之“德、言、容、功”》《同姓名》《淇鲫》《认宗》《道学先生》《中堂》《观察第》《五子》《步军统领》《珍珠鞋》《江北提督》等,皆是对各种掌故的娓娓叙述。

其中的《陕西之“德、言、容、功”》,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于右任。于右任(1879年~1964年),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曾用笔名右任、骚心、大风、半哭半笑楼主、关西余子等,被尊称为“右老”,中国近现代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从1931年春起,于右任担任当时的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直至逝世。于右任思想开明进步,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谈判期间,于右任设家宴专门招待中共代表团,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这是国共和谈中唯一设家宴款待中共代表团的国民党元老。

张伯驹的《陕西之“德、言、容、功”》一文短小精悍,介绍近现代陕西印光法师、张季鸾、李仪祉、于右任4位名人,叙述从容,语言精简,而且锋端饱蘸情感,作者的褒贬之意也自然呈现:

余昔避日寇居秦,闻陕西人尝戏谓吾省有德言容功者四人:德者印光法师;言者张季鸾,《大公报》社论皆为其手笔;功者李仪祉,关中少雨多旱,渭水开渠皆为其所经营;容者则于右任也,辛亥革命陕人拥以为首,遂得誉,伟身长髯,相貌魁梧。后南京政府时任监察院院长,噤若寒蝉,毫无建白,陕人故以讥嘲,谓其徒有其表耳。

《礼记·昏义》云:“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因此,所谓的“德、言、容、功”,本意为封建礼教要求妇女应具备的品德。而张伯驹笔下的“德、言、容、功”,则别有所指。张伯驹在《陕西之“德、言、容、功”》中,叙述印光法师、张季鸾、李仪祉之事迹,实为铺垫,着重落笔在于右任身上。“容”指容貌、仪表,于右任绰号“于大胡子”,“伟身长髯,相貌魁梧”,典型的“美髯公”是也,容貌可谓出众,仪表可谓伟岸。但其在南京政府任监察院院长时,却“噤若寒蝉,毫无建白”,真是空有一副好皮囊。陕西人称其“容者”,讥嘲了于右任的徒有其表。

由此可见,张伯驹借“陕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其对于右任的态度是语多讽刺,没有好感。

另一位周口籍学者,现任河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全章教授撰文《于右任与晚清诗界革命思潮》,曰:“这位从陕西三原走出来的辛亥元勋和革命诗人,不仅1903年前后就以震惊关中士林的诗歌创作响应了‘诗界革命’,从而将诗界革命运动的阵线延展到大清帝国统治力量相对强大且士林风气沉滞的西北地区,而且在革命思潮和革命诗潮初盛年代即以报人身份躬身其役,成为革命派文人中的活跃分子。晚年流寓台湾时期,于右任仍对旧体诗抱有满腔改革热望,终其一生不负‘革命诗人’和‘爱国诗人’名号。”胡全章认为,于右任终其一生,都无愧于“革命诗人”和“爱国诗人”的名号。这与张伯驹对于右任的评价、观点甚不相同。

以上不同观点,足以说明人是复杂的。而对一个人的判断,采用简单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评价方式,亦是偏颇的。所以,我们评判历史人物时,应该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一分为二,全面深入,方能让历史人物鲜活立体,同时能够揭示人性的复杂。而且,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反复地探讨、争论、砥砺,对于历史人物研究也更能做到知人论世、全面深刻。

本版统筹审读:董雪丹